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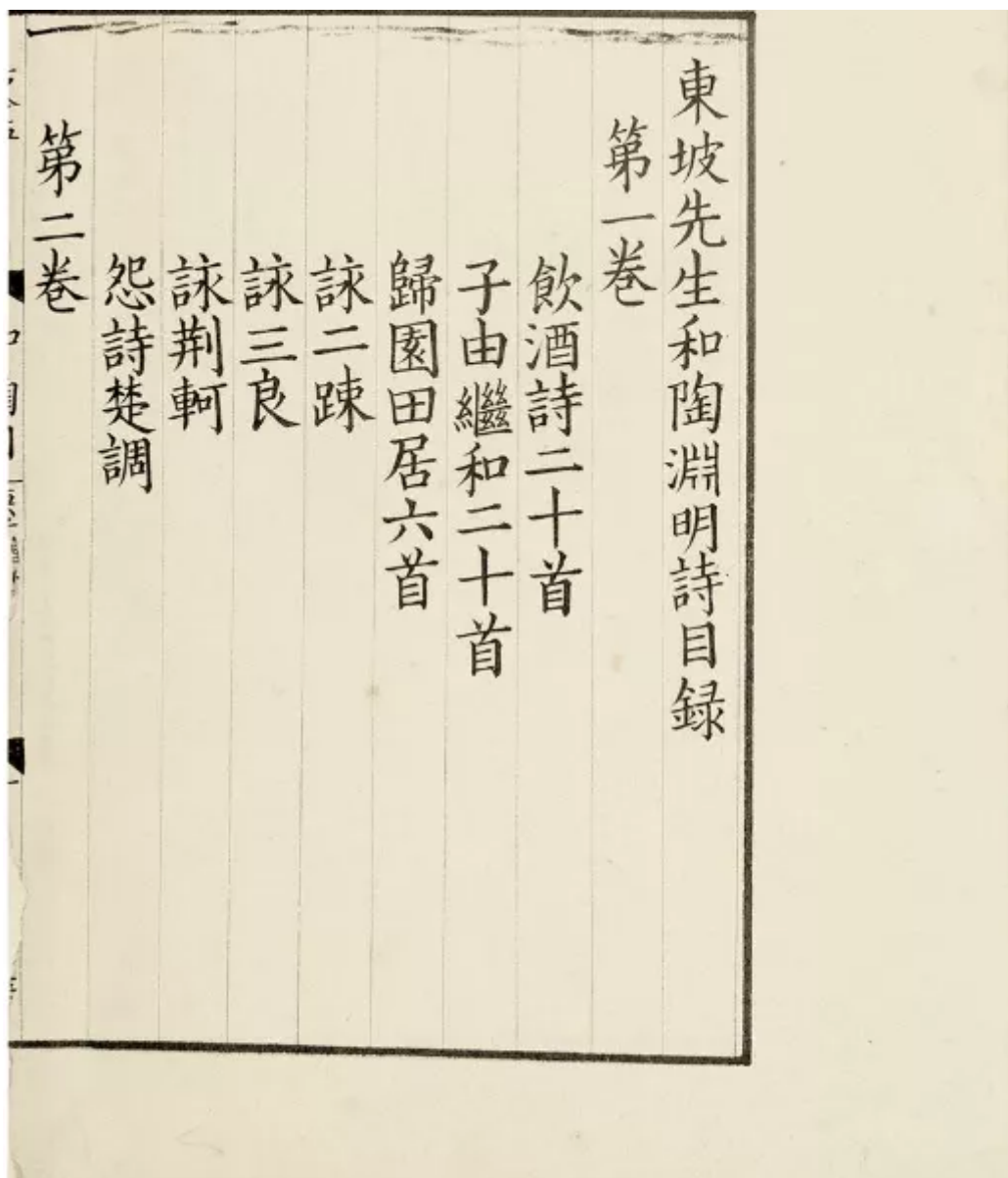
# 杨焄 || 傅共《东坡和陶诗解》探微

原创 杨焄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4月23日

## 傅共《东坡和陶诗解》探微

苏轼毕生创作了诸多和陶诗，晚年还特意将这些和诗结集成书。受此影响，其弟苏辙也有一部分继和之作。今存宋刊黄州本《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便收录了陶渊明的原作以及苏轼、苏辙兄弟二人的和作。[1]南宋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著录有“《和陶集》十卷。苏氏兄弟追和。傅共注”[2]，提到当时曾有傅共的《和陶诗》注本传世。现代学者大多据此来考察《和陶诗》在当时的流传情况，但因为资料匮乏，往往语焉不详。如曾枣庄等先生所著《苏轼研究史》认为：“这是宋人唯一的《和陶诗》注，因原书早佚，不知其详。”[3]王友胜先生在其《苏轼研究史稿（修订版）》中也述及此书，同样认为：“此似是宋人评解苏轼《和陶诗》的唯一著作，惜已不传，其详不得而知。”[4]实际上，傅氏生平概况及该书编纂背景仍然可以根据现存的一些宋元文献加以钩稽考索。此外，尽管目前凭借国内文献尚无法考察傅注本的详情，但在留存于韩国的蔡正孙（1239—？）所编《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中却征引过不少傅共的注文[5]。只是由于此书已知的三种残本目前均收藏于海外[6]，故其详情尚不为国内学术界所知，对其中引录的傅注内容也就无法进行较为深入系统的探讨。笔者曾有缘先后获睹这三种残本[7]，兹据其中所引傅注，并联系其他文献，对傅共的生平大略及该注本的编纂背景、内容特点等略作考辨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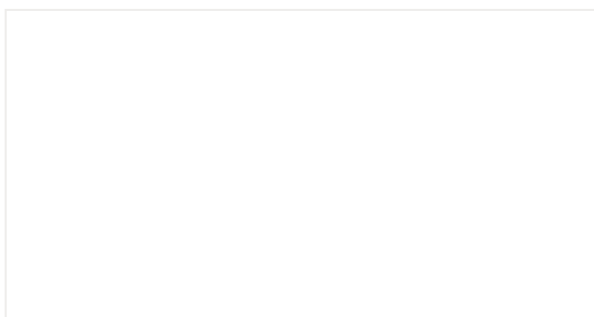
宋刊黃州本《東坡先生和陶淵明詩》


## 一、傅共生平及《東坡和陶詩解》的編纂背景

在宋元時期的文獻資料中，對傅共的生平仕宦有過一些簡略的記載。如李俊甫撰《莆陽比事》卷三著錄有：“傅共注釋《東坡和陶詩解》。”小注云：“仙遊人，紹興壬子奏名。”[8] 趙與泌、黃岩孫纂修《仙溪志》卷二《進士題名》“紹興二年張九成榜”條下列有：“特奏名：傅共，權子。”[9]同卷《令佐題名》云：“傅共，奉直郎、守國子博士、騎都尉，賜緋魚袋，崇寧三年。”又同書卷四《宋人物》“傅權”條下云：“子共，三荐奏名，文詞秀拔，有《東坡和陶詩解》。”這些文獻記載，提供了有關傅共生平經歷的基本內容。蔡正孫《精刊補注東坡和陶詩話》在引錄傅共之說時常常徑稱“仙溪畸人傅共”或“傅仙溪”，蓋因傅氏為仙溪人氏，故有此稱呼。此外，今存宋人傅幹《注坡詞》前載有序言一篇，末署“竹溪散人傅共洪甫”，序文中則稱傅幹為“余族子”，[10]這些零星的內容也提供了部分重要的線索。排比整合上述各種記載，可對傅共生平做如下概括：傅共，字洪甫，號竹溪散人、仙溪畸人，福建仙溪人，傅權之子。生卒

年不详，活动于南北宋之际。南宋绍兴二年壬子（1132）特奏名进士，历仕奉直郎、守国子博士、骑都尉等职。[11]根据上述史料记载，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所载傅氏撰《和陶集》注本的全称应为《东坡和陶诗解》。傅共虽然有过仕宦经历，但所任官职品阶并不算高，且从其“竹溪散人”、“仙溪畸人”等别号来看，颇有几分与世不偶、悠游闲散的意味，与苏轼创作和陶诗时的心态倒是颇为契合，这或许是他着手注释《东坡和陶集》的原因之一。

傅共在为《东坡和陶诗》作注之前曾经做过不少准备工作，甚至利用个人交际关系进行过资料搜集。傅幹《注坡词》卷八《点绛唇》五首末有注云：“此后二词，洪甫云亲见东坡手迹于潮阳吴子野家。”可知傅共曾亲眼目睹东坡手书词作，并据此为傅幹撰著东坡词注释提供过帮助。注文中提及的“潮阳吴子野”即北宋时的吴复古。吴复古，字子野，潮阳人，生前曾与苏轼兄弟交好，诗文酬唱颇为频繁。[12]吴氏为人处事高逸超脱，颇有渊明之风。在苏轼的和陶诗作中时常提到他，如《和陶〈岁暮和张常侍〉》小引：“十二月二十五日，酒尽，取米欲酿，米亦竭。时吴远游、陆道士皆客于予，因读渊明《岁莫和张常侍》诗，亦以无酒为叹，乃用其韵赠二子。”[13]又《和陶〈杂诗〉》其七：“昔与吴远游，同藏一瓢窄。”[14]其中的“吴远游”即指吴复古而言。[15]吴复古之子吴芾仲能文善书，也曾得到过苏轼的称赏，屡有往来馈赠与酬唱。[16]吴氏父子均与苏轼交好，留存在吴家的东坡书翰、诗札自然不在少数。傅共能够得到允许展观苏轼手迹，足见与吴氏后人交谊匪浅。这层关系也使得他在注释《东坡和陶诗》的过程中得到了旁人无法获取的便利。蔡正孙《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在苏轼《和陶〈杂诗十一首〉》其七“蓝乔近得道，常苦世褊迫”句下曾征引傅共注文云：“蓝乔，循州人，修道于循之霍山，乃元佑间人，与吴子野游。后子野游京师，为苏公所留。蓝屡招之不至，作诗寄之曰：‘逢君天汉桥，岂是厌蓬蒿。一褐尘埃里，五侯名姓高。寻芳煮白石，待月唱《离骚》。旦晚天台去，千年只种桃。’乔后得道尸解。”从注文的内容来看，此事原委显然只能直接得自吴氏后人，而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获取。“蓝乔”在蔡正孙《诗话》的正文中被误作“蓝桥”（参见下文），而裴航蓝桥遇仙的典故在苏轼其他作品中也确实被多次使用过，如《次韵舒教授寄李公择》云：“细思还有可恨时，不许蓝桥见倾国。”[17]《南歌子·寓意》云：“蓝桥何处觅云英，只有多情流水、伴人行。”[18]蔡正孙或许受此影响而做出误判。此处若非傅共得到确证，恐怕难免会以讹传讹，贻误后人。





蔡正孙《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

傅共编纂《东坡和陶诗解》与其家族文化传统或许也有直接的关联。其籍贯所在地福建仙溪虽然仅是蕞尔小邑，却极为重视文化学术，“地方百里，科第蝉联，簪纓鼎盛，甲于他邑”[19]。傅氏一门就属于当地“科第蝉联”的世家大族。仅据宋元之际赵与泌、黄岩孙纂修的《仙溪志》记载，当时就相继有二十五人登进士第，傅共之父傅权也名列其中。[20]其家族成员中有些人对苏轼颇有研究，如上文提及傅共族子傅幹有《注坡词》之作，这是现存最早的一部东坡词注本，在当时就颇有影响。据洪迈《容斋续笔》云：

绍兴初，又有傅洪秀才《注坡词》，镂版钱塘，至于“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不能引“共道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之句。“笑怕蔷薇罨”，“学画鸦黄未就”，不能引《南部烟花录》，如此甚多。[21]

他指摘的几处疏漏大致与今存《注坡词》的内容吻合，[22]因此文中所谓“傅洪”当是“傅共”之误。龙榆生先生曾就此推测说：“殆以卷首有(傅)共序，共字洪甫，牵涉而率诋之欤？”[23]这是可以采信的判断。根据洪迈所言，《注坡词》在绍兴初年就已在钱塘地区付梓。《东坡和陶诗解》成书的具体时间虽已不可详考，但考虑到傅共曾为《注坡词》作序，且称傅幹为“族子”，年辈至少不会小于傅幹。而傅幹邀约傅共来为该书作序，自然是因为傅共对其中甘苦颇为熟悉的缘故。傅共在序中称赞东坡词“寄意幽渺，指事深远，片词只字，皆有根柢，是以世之玩者未易识其佳处”，并谓傅幹所注“敷陈演析，指摘源流，开卷烂然，众美在目”[24]，可见他对于苏词的佳妙以及作注者的苦心确实都深有体会。若不是对此素有关注，恐怕很难产生如此真切的感受。而且前文已经提及，傅共还曾利用自己掌握的资料为傅幹作注提供过帮助，则他本人在资料的搜集、积累方面应该已经花费过不少的精力和时间。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傅共撰著《东坡和陶诗解》的时间似当在傅幹《注坡词》之前，即于绍兴初年

甚至稍前的南北宋之际就已经完成了。

今存南宋时人所编的苏轼年谱中尚有一种《东坡纪年录》，题为“仙溪傅藻编纂”[25]。此谱最早附载于南宋黄善夫家塾本《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其成书时间约在南宋中期以前。[26]傅氏在跋文中曾简述其纂述过程：

汴阳段仲谋编为《行纪》，清源黄德粹撰为《系谱》，一则择焉而不精，一则语焉而不详。予于暇日，因二家之述，遍访公之文集，采其标题与其岁月，芟夷繁乱，剪裁浮辞，而质诸名士大夫，以求其当，足以观公宦游穷达之节，吟咏著作之时，名之《东坡纪年录》。[27]

可见他为编纂此谱花费了不少精力，在参酌前人著述、征询各家意见的基础上，对苏轼诗文作年进行过较为细致的考辨，因而此书在宋人所编诸多东坡年谱中尤以诗文作品系年见长。此外，苏轼诗集早期曾有所谓“五注”、“八注”和“十注”等注本，现存“五注”与“十注”拼合本《集注东坡先生诗前集》的宋刻残帙，其中所引诸家注文里有部分题作“傅云”的内容，据研究者分析，即指傅藻而言。[28]可见除了编纂《东坡纪年录》之外，傅藻对苏诗也颇有深入的研究，或许还曾有评注流传于当时。傅藻也是福建仙溪人，且活动时间与傅共、傅幹接近，三人出自同一宗族的可能性极大。[29]

综上所述，可知福建仙溪傅氏素有苏轼研究的传统，对于东坡的诗词创作、生平行年等，都有专门著述刊刻传世。傅共着手撰著《东坡和陶诗解》，与这样的家族文化传统应当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样的编纂背景对于傅注本的格局也带来一定的影响。尽管傅注的内容涵盖陶、苏三人的作品，但三者的比重是较为悬殊的。在蔡正孙《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中征引的《东坡和陶诗解》佚文共有四十七则，其中与陶渊明作品有关的仅四则，与苏辙作品相关的也只有六则，而与苏轼作品相关的则多达三十七则。[30]出现这样的结果，原因可能有两个：或是傅注本中有关苏轼的内容原本就远远多于陶渊明，或是傅注本中的陶渊明部分精义无多，因此蔡正孙也就未多加采摭。不论究竟是出于何种原因，都足以说明傅注本的重心在于苏轼而非陶渊明。而这和福建仙溪傅氏擅长苏学研究，傅共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久受熏陶当有一定的关联。

## 二、《东坡和陶诗解》的文本渊源

《东坡和陶诗》原先曾别本单行，其中所载陶、苏诗作与两家别集的文字多有出入。日本学者桥川时雄认为：“其中所录陶作，与他本陶集，多有异同，亦颇可资校读。”[31]中国学者刘尚荣则指出：“其诗句本身及各诗小引的文字，亦每与今传各本苏轼诗集有异，极富校勘价值。”[32]这些意见都表明《和陶诗》在文字校勘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为现知最早的《和陶诗》注本，傅共的《东坡和陶诗解》在版本校勘方面自然也同样值得关注。可惜傅注留存至今数量并不多，无法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可是，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也同样重要，即傅共在确定其注本的文本

时是否径以《东坡和陶诗》作为底本，还是别有所据？通过考察傅注佚文与陶、苏别集之间的差异，倒是可以对其文本渊源加以推断。

陶集自问世起便传本纷繁，宋代以后，“以展转传写翻刻之故，鲁鱼亥豕，触目皆是，讹本既传，真本转湮”[33]。现存傅共《东坡和陶诗解》佚文中涉及陶集异文的有《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以及《读〈山海经〉十三首》其十二这两首。兹以蔡正孙编《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简称“蔡本”）及所引傅共注（简称“傅注”）为主，参校宋刊黄州本《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简称“黄州本”）[34]、旧题苏轼手书本《陶渊明集》（简称“苏写本”）[35]、南宋曾集辑《陶渊明诗》（简称“曾本”）[36]、南宋汤汉撰《陶靖节先生诗注》（简称“汤本”）[37]、元李公焕辑《笺注陶渊明集》[38]、清陶澍集注《靖节先生集》（简称“陶本”）[39]，将各本异文分列如下：

**表1.陶渊明《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各本异文一览**

|  |
|--|
|  |
|--|

**表2.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其十二各本异文一览**

|  |
|--|
|  |
|--|



现存资料的有限给深入考索傅注本中陶诗的文本渊源带来很大的困难，然而仍不难发现，尽管傅注本中的陶诗在文字上与早期诸多陶集中的任何一种都存在一定的歧异，但这几处异文大都有渊源可循，并非是其逞臆妄为。而且从这些来源不一的异文来看，傅共在确定陶诗文本时很有可能对来源各异的不同版本做过较为细致的比较，最后才择善而从。

再来考察一下傅注本中苏诗的情况。现存傅注涉及苏诗异文的有《和〈连雨独饮〉》其二、《和〈杂诗十一首〉》其七以及《和〈贫士七首〉》其五这三处。以下同样以蔡正孙编《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简称“蔡本”）及所引傅共注（简称“傅注”）为主，参校宋刊黄州本《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简称“黄州本”）[40]，南宋施元之、顾景蕃合编《注东坡先生诗》（简称“施顾注”）[41]，清王文诰、冯应榴辑注《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简称“王本”）[42]，将各本异文分列如下：

**表3. 苏轼《和〈连雨独饮〉》其二各本异文一览**

**表4. 苏轼《和〈杂诗十一首〉》其七各本异文一览**

|  |
|--|
|  |
|--|

**表5.苏轼《和〈贫士七首〉》其五各本异文一览**

|  |
|--|
|  |
|--|

上述第一例（表3）中，后世诸本都与傅注保持一致，而不同于蔡本。第二例（表4）中，除施、顾注本外，其余各本均与傅注本相同；而上文已经提及，傅注所言得自当事人的后世子孙，其准确性是无可置疑。至于第三例（表5）的文本，在宋代就已聚讼纷纭。蔡正孙在该诗后曾先后征引《苕溪渔隐丛话》、《邵氏闻见后录》等书，提及古人九日诗罕用“糕”字，以及前人诗中用“糕”字的先例，并作按语云：“但诸公所载，则皆不及坡公‘糕酒出太官’之句，何邪？”对此颇感疑惑，随后即引述上述傅共注文，最后总结说：“未详孰是？虽以‘羔’字言太官之羊不为碍理，但取重九事则无关涉。□愿与言诗者商之。”依旧是左右为难，难以决断。可见此处究竟是作“糕”还是作“羔”，在当时并无定论。傅共或许也正是考虑到“诸公所载，则皆不及坡公‘糕酒出太官’之句”，才根据诗意取“羔”而舍“糕”。

金程宇先生曾对《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的苏诗文本做过简要的抽样比勘，得出如下的结论：“虽然傅共注本《和陶诗》已失传，但作为《和陶诗》的版本系统，黄州本、两足院本（引者按：指日本建仁寺两足院藏《东坡集》）还是可以参照的，从目前的异文来看，《诗话》（引者按：指蔡正孙《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似乎是以《和陶诗》来作为底本校录苏诗的。……蔡正孙在编校《诗话》时，当是以《和陶诗》为底本，而以他书参校的。傅共《和陶诗》的文本原貌不详，部分差异也很可能是由傅本带来的。”[43]其意似乎认为蔡正孙《诗话》在确立其注本时即以《和陶诗》为底本，但其中存在的八



蔡氏抄《诗话》仕确定办诗底本时尽管定以《和陶诗》为主，但其中仔仕的分歧也可能与傅注本有关系。从上列三例异文来看，这一推断是值得商榷的。尽管蔡氏注意到了傅注本的异文，并通过引录注文来提示读者，但在正文中却并未完全采纳其意见。由此可见蔡氏在底本选择和文字校勘方面还是有自己的考虑，受到傅注本的影响并不大。不过参酌后世苏集的情况，各本在文本取舍方面多与傅注本一致，足见傅注本较蔡氏《诗话》有不少优长之处，可知傅氏在处理文本时还是较为合理的。



李仁荣《清芬室书目》著录《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

因为受到资料的限制，无法做更多的比对分析，但通过以上所举异文诸例不难发现，相较于苏诗部分的简单明晰，陶诗部分的差异显得更为复杂纷繁。这与陶、苏两家别集在当时的流传状况似不无关系。北宋宋庠曾刊刻过陶集，在其《私记》中言及：“余前后所得本仅数十家，卒不知何者为是。”[44]南宋蔡居厚也曾感叹：“渊明集世既多本，校之不胜其异。有一字而数十字不同者，不可概举。”[45]说明宋人所见陶集版本众多，异文丛集，以致令人难做取舍。这也可以从上文例证中所展现出来的复杂情形得到具体的印证。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否因为陶集虽然从宋代开始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在此之前的文本流传还属于写本阶段，一旦转入到刻本阶段，其文本形态尚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而苏集虽然也有不同的版本流传，但毕竟从一开始就已经依托版刻来进行，文本形态相对而言较为稳定的缘故？这是个饶有兴味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探究考察。

### 三、《东坡和陶诗解》的内容及特点

蔡正孙《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征引的傅共《东坡和陶诗解》佚文涉及陶潜及苏轼、苏辙兄弟共三人的作品。陶集之有注，前人多追溯至咸淳元年（1265）前后付梓的汤汉注《陶靖节先生诗》。郭绍虞先生则根据南宋魏了翁《费元甫注陶靖节诗序》，认为费氏注本成书于嘉熙元年（1237）之前，当早于汤注本。[46]不过无论何者在前，其付梓行世显然都要晚于上文已予考订的在绍兴初年或稍前就已经成书的傅氏注本。另据今人研究，宋人有关苏轼诗集的笺注数量约有十馀种。[47]但目前可以考知最早的苏诗注本为赵夔的《注东坡诗集》，其刊刻时间已在南北宋之际，[48]与傅注本约略同时。至于苏辙诗，则自宋迄今均无注本。因此，尽管《和陶诗》中收录的并非三人的全部作品，但傅注本在陶、苏诗文注释史上的地位仍然值得关注。

从傅注本残存的佚文来看，其内容主要是对陶潜、苏轼、苏辙三人的诗文进行说解串讲，间或也穿插一些字词注释，但数量并不多。就全书体例而言，更类似逐句诠释文义、发挥奥旨的讲疏体，而不是以注音释词为其要务的笺注体。兹各举一例如下：

陶渊明《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迨夕思鸡鸣，及晨愿景迁。”蔡正孙《诗话》云：“傅仙溪云：在夕则思晨，在晨则思夕，以饥寒所逼也。”

苏轼《和〈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江左古弱国，强臣擅天衢。渊明堕诗酒，遂与功名疏。”蔡正孙《诗话》：“傅仙溪云：汉末天下三分，而吴有江左。及晋室永嘉南迁，其后刘裕擅命，晋遂微弱，而裕乃兴宋，故曰：‘强臣擅天衢。’渊明以刘裕移晋祚，遂不复仕，故曰：‘与功名疏。’”

苏辙《和〈归去来辞〉》云：“相冬廩之亿秭，知春龙之耘耔。视白首之章黻，信孺子之书诗。若妍丑之已然，岂临镜而自疑。”蔡正孙《诗话》云：“傅仙溪云：此言农人冬获仓廩亿秭之厚，乃自于春垄耘耔耕种之力；士者白首有冠章甫、垂绅鞬之荣，乃自孺子时学诗书之力。此二者必至之应，若妍丑之于镜，昭然而无疑也。”

为便于更好地展现傅注本的特色，不妨将之与宋元时期的一些陶集、苏集注本做一番比较（苏辙诗文向无注本，暂阙不论）。南宋汤汉《陶靖节先生诗注》卷二对上面这首陶诗并无注解，显然是认为诗旨明晰，毋庸饶舌；至元代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二于该句下始有小注云：“谓日乌月兔飞走之速也。”仅指出时间流逝之快而未及其余，又平空添加了原作中并没有出现过的“日乌月兔”，实际上已经给普通读者造成不必要的阅读障碍。相较之下，傅注显得更为通俗浅近，并能深入抉发出诗人感慨身世坎坷的内蕴，有助于读者领会诗意。再看苏诗，施元之、顾景蕃《注东坡先生诗》卷四十一《始经曲阿》仅在“天衢”下注云：“后汉孔融荐祢衡表曰：‘龙跃天衢。’”只是注出字面出处，而没有像傅共那样结合历史背景对诗意作细致疏解，对于读者的阅读理解并无多少助益，不免貽人“释事忘义”之讥。

傅共在诠解作品时侧重内容串讲，不避通俗浅近，对典故出处、字词训诂等却颇不经意。我们可以由此大胆推测，其撰著《东坡和陶诗解》时所预设的读者群绝非文化素养深厚的知识精英阶层，而应该是文化水准并不算太高的普通读者。为了贴近这些普通读者，引发他们的阅读兴趣，他有时还会联系自己的生平见闻来疏解作品，试看以下两例：

苏轼《和〈时运〉》：“废井已塞，乔木干霄。……下有碧潭，可饮可濯。”蔡正孙《诗话》云：“傅仙溪云：予尝游白鹤峰公之故居，旧基依然，峰巅乔木数本参天，其北下瞰长江之潭，岸傍巨石，可容数人布坐。”

苏辙《和〈劝农〉》“计无百年，谋止信宿。”蔡正孙《诗话》云：“傅仙溪云：海康之俗既不耕稼，而闽人多以舟载田器，寓居广南，耕田不为长久之谋，但为二三岁之计。”

前者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对作品的具体描绘进行印证，后者则是凭借自己身为闽人的优势来介绍闽地特有的民风习俗。傅共当日提笔作注时思接千载、抚今追昔的情形，即便是在千载之后也不难想见。这样的注文虽然稍嫌游离文本，却也自具特色，既能让读者感觉口吻亲切，不至将此书视为高头讲章而敬而远之，又可使读者平添身临其境之感，进一步加深对诗意的体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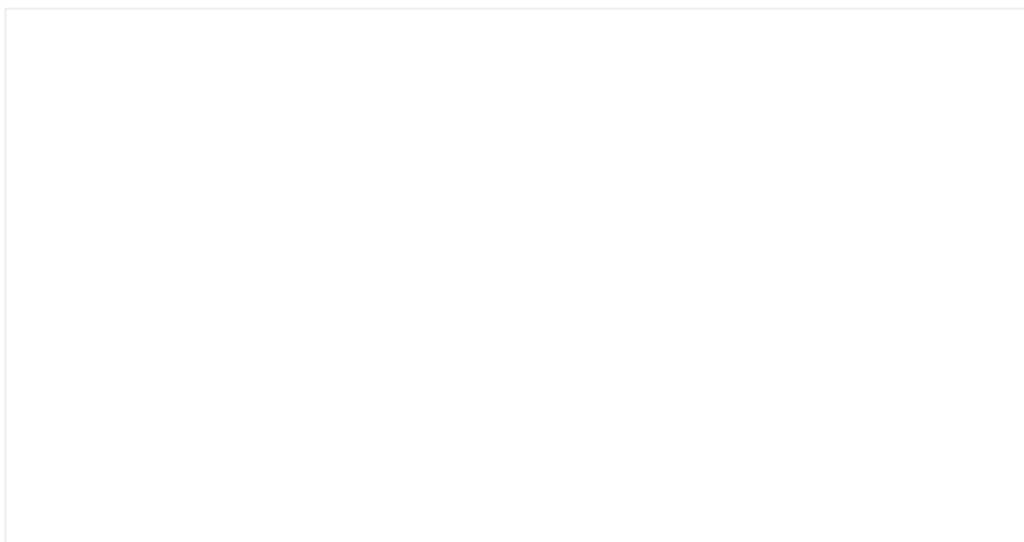
傅注并不注重征引文献以诠释故实，就学术性而言自然是较为欠缺的，有时还难免会产生一些疏漏。[49]但若考虑到这毕竟是筚路蓝缕的工作，也就不必求全责备了。而且转换视角来看，这样的诠释方法其实也别具一格。现存《东坡和陶诗解》佚文多为对苏轼作品的注释，因此要分析此书的注释特点，自然要着重讨论傅共在注释苏诗的重心所在。在为苏诗作注时，傅共对其创作背景颇感兴趣，每每会结合东坡行年来予以介绍，时常有知人论世之言，从《和〈移居二首〉》的注文中就可见一斑：

苏轼《和〈移居二首〉》其一：“歌呼杂闾巷，鼓角鸣枕席。”蔡正孙《诗话》云：“傅仙溪云：公在惠州，初居水东嘉祐寺，后迁水西，近李家潜珍阁，密迩州治，故有‘闾巷’、‘鼓角’之喧杂。”

苏轼《和〈移居二首〉》其二：“洄潭转碕岸，我作江郊诗。今为一廛氓，此地乃得之。葺为无邪斋，思我无所思。古观废已久，白鹤归何时？”蔡正孙《诗话》：“傅仙溪云：公居水西，厌其嚣尘，后移居白鹤峰。”“傅仙溪云：白鹤观地之北有江潭，公作室于观基，有思无邪斋。”

施元之、顾景蕃《注东坡先生诗》卷四十一对这组诗只注明字句典故的出处，对其创作背景只字未及，与傅注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就目前所见到的佚文来看，傅共注本仅对苏诗的创作背景感兴趣，而对陶诗的创作背景则毫无涉及。我们认为傅共注本原先的情况很可能就是如此，因为蔡正孙在采摭傅共注本时，不可能只选取与苏诗创作背景相关的内容，同时又有意识地舍弃有关陶诗创作背景的内容。这种注释方面的偏向或许和宋人所编苏轼年谱的大量出现有一定关联。现能考知其编者、书名的宋人所撰苏轼年谱约有十种左右。不同的年谱也呈现出各自的特色，其中一些除了记载生平仕履之外，还会附载诗文唱和等内容。傅共身处其间，自然会受到影响。上述傅藻所撰《东坡纪年录》对苏轼作品的创作时间也表现过浓厚的兴趣，例如“绍圣三年丙子”条云：

（二月）二十一日，饮醉食饱，默坐思无邪斋，兀然如睡。既觉，和渊明“东方有一士”诗。……（五月）二十日，复归于嘉佑寺。时卜新居于白鹤峰，作《迁居》诗。又和渊明《移居》诗。[50]



施元之、顾禧、施宿《注东坡先生诗》

将年谱所述与上引傅注互相参证，对于苏轼创作和陶诗的具体背景无疑可以有更为真切细致的了解。傅藻在《纪年录》跋文中曾提及“又将因此而类公之诗文，使成次序，固有志焉，姑少候之”[51]，似乎还曾有计划对苏轼诗文进行系统的编年。作为同一家族的成员且年辈略高的傅共，在注释苏轼作品时对相关事迹背景加以关注，或许对傅藻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苏轼的思想既以儒家为主，同时又出入释道，呈现出复杂多元的面貌。傅共对此有深切的体认，在注解苏轼《和〈归去来辞〉》时就曾指出：“东坡此篇全寓养生反照之理，兼释、道二家之论而发明其意也。”他在注释苏诗时也经常会引用道家、佛教的经典来加以诠释：

《和〈连雨独饮〉》其二：“醉醒可还酒，此竟无所还。”[52]蔡正孙《诗话》：“傅仙溪注引《楞严经》云：‘汝见八种性，当欲谁还？何以故？若还于明，则不明时，无复见暗，虽明暗等，种种差别，见无差别。诸可还者，自然非汝。不汝还

者，非汝而谁？”

《和〈赠羊长史〉》：“老马不耐放，长鸣思服舆。故知根尘在，未免病药俱。”蔡正孙《诗话》：“傅仙溪云：《圆觉经》云根性、尘性，六贼为根，六入为尘。此言‘老马’、‘思服舆’及‘根尘’、‘药病’之语，皆以喻少壮好书之心，虽老不忘也。”

《和〈岁暮和张常侍〉》：“玄膺流玉泉。”蔡正孙《诗话》：“傅仙溪注云：道家谓玄膺，口之下腭也；玉泉，玉液也，咽此以炼丹。”

成书时间在傅注之后的施、顾《注东坡先生诗》对这三首作品都有注释，可以拿来与傅注内容进行一番对照：

《和〈连雨独饮〉》注：“《楞严经》：佛告阿难：今当示汝，无所还地。”（卷四十二）

《和〈赠羊长史〉》注：“《战国策》：楚客谓春申君曰：‘昔骐驎驾盐车上吴坂，迂延负辕而不能进。遇伯乐，解而趣之。于是俯而喷，仰而鸣，以伯乐之知己也。今仆厄居之日久矣，君独无意使仆为君长鸣乎？’”《圆觉经》：圆圆无际，故当知六根遍满法界；（六）根遍满，故当知六尘遍满法界。”（卷四十一）

《和〈岁暮和张常侍〉》注：“《黄庭经》：‘舌下玄膺死生岸，出清入玄二气涣，子若得之升天汉。’注云：‘玄膺，通津液之岸也，管受精符。’”（同上）

施、顾二人虽然也征引了佛、道两家经典，但从内容来看，尚未能结合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诠释，不如傅注来得融通切实。傅共在注释时能够如此得心应手，当然是缘于他对佛、道两家典籍的熟悉，而这又与其祖籍福建仙游有着一定的关联。《仙溪志》在追溯本地邑名的来由时说：“盛唐之际，邑加仙游之名；晚唐以来，地有佛国之号。宜其神奇之迹、灵异之人并生，错出于此欤？”[53]提到自唐代以来，该地就因仙佛人物频频来游而得名“仙游”；随后又载录了当地诸多羽士、禅师的生平事迹以及寺院祠庙的设立情况。由于受到地域文化传统的熏陶濡染，傅共对于佛、道典籍自是谙熟在胸，在注释东坡诗文时也就能信手拈来了。

上文已经述及傅共曾为其族子傅幹《注坡词》提供资料并撰写序言，可见两人之间关系颇为亲密。而傅幹《注坡词》在解说苏词时也呈现出与傅共《东坡和陶诗解》相似的倾向。例如，傅幹也极为注意作品的创作背景，还特意搜集过不少题作“公自序”、“公旧序”的材料：

《注坡词》卷一《满庭芳》（“归去来兮”）傅幹注：“公旧序云：元丰七年四月一日，余将自黄移汝，留别雪堂邻曲二三君子。会李仲览自江东来别，遂书以遗之。”

《注坡词》卷七《永遇乐》（“长忆别时”）傅幹注：“公自序云：孙巨源以八月十五日离海州，坐别于景疏楼上，既而与余会于润州，至楚州乃别。余以十一月十五日至海州，与太守会于景疏楼上，作此词，以寄巨源。”

这些注文虽然不尽出自苏轼之手，但对于考察东坡词创作背景，乃至研究作者生平而言都是十分珍贵的材料。[54]此外，傅幹在笺注过程中对于东坡词

中运用的道、释两家典故也极为熟悉：

《水龙吟》其一：“人间自有，赤城居士，龙蟠凤举。”傅幹注：“司马子微隐居天台之赤城，自号赤城居士。尝著《坐忘论》八篇，云：‘神宅于内，遗照于外，自然而异于俗人，则谓之仙也。’”

《西江月》其一：“老夫鼻观先通。”傅幹注：“‘鼻观’，见《圆觉经》。”

《南歌子》其八：“寓身此世一尘沙。”傅幹注：“内典：化佛以三千大千世界，其众犹微尘，其数犹恒河沙。”

这些注释都显得要言不烦，贴切精当。有些内容还颇为罕见，如《水龙吟》注中提及唐代司马贞（字子微）著有《坐忘论》，在新、旧《唐书》本传及《大唐新语》等相关文献中均未载其事，因此直至现当代，众多重要的苏词笺注本也都沿用其说。[55]他之所以能如此娴熟地征引二家典故，应该和傅共同样，是受到福建仙溪一带地域文化传统影响的结果。傅共、傅幹两人在注释旨趣上的这些共同趋向显然是值得深入关注和考察的。

苏轼采取次韵古人的方式创作了一系列和陶诗，不仅完成了对陶渊明形象的重塑，确立起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而且也意味着其自身创作风貌和处世哲学的重要转变，与此同时还引发了一股自宋迄清持续不绝的和陶风气。馀波所及，甚至在周边的日本、韩国也都出现过不少和陶作品。足见这一行为的意义早就已经超越了文学本身，而具备了某种特殊的文化象征意味。傅共《东坡和陶诗解》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宋人《东坡和陶集》注本，对于考察陶渊明以及苏轼兄弟作品在宋代的流传与接受状况而言，自然是不可多得的重要参考资料。而更重要的是，出现这样的早期注本，实际上已经充分说明“和陶”这种具有丰富内蕴的文化现象早在南宋初期就开始引起时人的关注，并将相应的研究工作付诸实践，而其成果也确实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1]. 宋刊黄州本《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凡四卷，近人张宗祥曾于1923年集资翻刻，原本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影印件连续刊载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主办的《中国苏轼研究》第二、三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2007年。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附录二《和陶诗九种》有整理本，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621—662页。

[2].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徐小蛮、顾美华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第446页

【本文原载《中山大学学报》2013年第06期，感谢杨焄老师授权发布。】

喜欢此内容的人还喜欢

吴真 || 协作与刺激：七十年海外中国说唱文学研究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